

013057761

D693.74
32

战后中国国民党派系关系之研究

——以党政革新运动为中心的探讨

周维朋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航 C1668185

D693.74
32

0130277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中国国民党派系关系之研究：以党政革新运动为中心的探讨/周维朋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000-9193-6

I. ①战…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国民党—派别—研究—民国 IV. 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915 号

策划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程广媛
责任印制：倪 亮
封面设计：海马书装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88390093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作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0.5 字数：156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00-9193-6

定价：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20)	(1)
(25)	(1)
(33)	(5)
(41)	(7)
(85)	(9)
(91)	(10)
(95)	(11)
(109)	(16)
(109)	(26)
(111)	(30)
(133)	(32)
(134)	(36)
(138)	(41)
(141)	(42)
(143)	(43)
(152)	(52)
(157)	(57)
(158)	(58)

二、党政革新的主张与推展	(66)
第三章 党政革新运动中的派系暗斗	(72)
第一节 中苏交涉与东北接收	(73)
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74)
二、东北接收受挫后党内的反弹声浪	(82)
第二节 拥蒋派对中共问题的歧见	(91)
一、政学系主导下的国共谈判	(92)
二、革新分子对于国共协商的抵制	(98)
第三节 革新运动中的派系运作	(109)
一、派系的联合与斗争	(109)
二、蒋介石对党政革新的态度与反应	(112)
第四章 从革新到改造——革新运动的沉寂	(116)
第一节 革新力量的涣散	(116)
一、党团合并中的派系分裂	(117)
二、党内革新、党外冲突——行宪选举中的派系斗争	(122)
第二节 革新沉寂后的党务改造	(133)
一、政局逆转中的党务改造	(134)
二、改造前的权力重整	(138)
结 论	(146)
征引资料	(151)

绪论

一、研究动机

每逢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或为了顺应时代环境的变迁，国民党人总是以改组、革新或改造等方式，希图为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振党的革命精神，以求因应革命情势的发展^①。因此，回顾百余年来国民党的历史变迁，亦可说是一部描述国民党不断地改造、革新的革命史。

然而，从另一角度观之，虽然国民党人一向讳言派系，但在国民党党史上历次的改组与革新，无一不与党内派系势力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党内派系势力的冲突与妥协，亦可说是历次党务革新的缘由与结局。

造成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虽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然而党内各派系之间相互对立、冲突的结果，不仅对国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亦使得党内权力交替制度无由建立，造成派系冲突持续不断。因此，大陆学者郭绪印在其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中，即曾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国民党史简直是一部派系斗争史”^②。同时，愈来愈多关于战后国民党党史的研究，也开

^①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迁台前后的改造与创新（1949-1952）》，《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集》，第五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1月，页595。

^②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册，《序言》，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页1。

始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因素，指向党内派系的纷争^①。

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起，到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全国党政军最高负责人。而在蒋介石政治地位崛起的过程中，一批以巩固蒋介石个人的领导地位为中心的派系势力亦逐步成形，并且成为国民党内派系势力的主流，这些拥蒋派系至少包括政学系、CC派以及黄埔系主导下的复兴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系统。

然而，巩固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只是这些拥蒋派系的共同目标之一，在另一方面，拥蒋派系本身也各自寻求发展与扩张的途径，意即向外对付反蒋势力的同时，对内亦是彼此摩擦不断。中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局促于西南一隅，在各地方实力派自我保全的意识下，中央政府的统治势力始终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斥，其中又以国民党中央各个派系——如政学系、CC派以及以黄埔系、复兴社为主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系统等所受的影响为大。因此，各派系为争夺战时有限的政治资源，彼此间的摩擦与对立更加激烈^②。

约自1940年代中期起，直至中日战争结束前夕，国民党内部兴起了一阵改革党务的呼声，针对此一现象，研究国民党党史的学者李云汉指出：

八年对日抗战（1937 - 1945）期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发展迅速，党政关系也有所调整，但到抗战末期，党的组织出现涣散现象，权力的运作亦有欠灵活，党员的党德和党纪已渐趋废弛。三十四年即1945年5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行宪，同年8月抗战胜利后继之以党派间的

^① 李云汉、林能士等皆指出派系纷争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分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三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11月，页701；林能士，《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与国共商谈——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探讨》，收录于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6年，页938。

^② Ch' i, Hsi - 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 - 19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p. 207.

政治商谈；政治情势和社会环境均有剧烈的变化，中国国民党之必须实行革新，乃成全党上下之共同要求。^①

除了党务发展无法适应政治局势变化的因素之外，党内的革新诉求亦与抗战以来，外界舆论对国民党政权的批评有密切的关联。

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各界舆论对于国民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贪污传闻以及行政效率低落等人谋不臧的现象，展开无情的揭露与严厉的批判，其中以美国和中共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影响最大，对国民党的革命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大约自1940年起，抗战以来全民团结一致对国民党的支持景象已不复见。此时，国民党的支持者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界不满的舆论与责难^②。

此外，战争末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因此日本乃于1944年春开始，集中全力在中国战区发动“一号作战”。在日军猛烈的攻势下，国军连连失利，国民政府的处境岌岌可危。

在外弛内张的情势下，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前夕，部分国民党党员酝酿发起了一场名为“党政革新”的政治运动，针对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国民政府统治下种种导致外界批评、政局不稳的弊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与检讨。此时，党政革新所关注的目标在于如何挽救时局，以及重振党风，并为战后国民党所必须面临的国共斗争做准备。

中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重新回到睽违数年之久的沦陷区，为收拾战后残局，国民政府随即积极展开各项重建工作。然而，国民党人对于时局的不满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复以战后政学系在多项政治议题上，以及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优势地位，因而引发党内其他派系的不满，纷纷以党内民主为由，打击政学系在权力核心的地位与作用。这些派系并利用战后一般舆论对东北问题的不满，以及党内对国共协商的歧见，对

^①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迁台前后的改造与创新（1949-1952）》，《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集》，第五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1月，页595。

^② 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月，页299。

政学系成员大加抨击。因此，战后党内派系势力的变化，使得党政革新的焦点逐渐从检讨各项党政制度的得失，渗入党内派系冲突的因素。

就在 1946 年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前后，以国民党内 CC 派为主的革新势力，结合部分黄埔系成员，高举“党政革新”的旗号，开始大力推行“党政革新运动”，创办《革新周刊》，举办“党政革新座谈会”，并在各地方党部推行类似的集会与刊物。借着党政革新运动的推展，革新成员极力主张清除党内的“官僚政客”、“腐化势力”等，恢复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并借机改革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推动党内民主、打破党内派系组织等。

然而，在“党政革新运动”的推展期间，国民党人实已无法免除党内存在已久的派系恩怨的影响，“党政革新”因而成为派系之间打击异己的借口。而革新势力本身亦因党、团之间的恩怨与冲突而逐渐涣散。1947 年 8 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前夕，革新成员为了因应党、团合并，加强党内团结，使革新运动推展于全党，乃宣告结束“革新座谈会”，使得“党政革新运动”消沉以终，革新势力逐渐涣散。

革新运动消沉后，原本党、团之间的对立与摩擦愈演愈烈，拥蒋阵营祸起萧墙，造成党权松落，党纪不彰，以桂系为主的反蒋势力乘势而起，国民党内部形同散沙，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国民党内派系政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亦可说是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本书撰写的主要目的，即在于透过对国民党内派系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分析 1940 年代国民党内革新运动的成败关键，另一方面，借由“革新运动”与“派系政治”两项交互影响的因素中，从战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派系因素。

^① 林能士，《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与国共商谈——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探讨》，《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6 年，页 938。

二、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史料的运用

随着研究风气的开通与史料的解禁，有关国民党内派系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与日俱增。然而，学界关于本书的主题——由国民党内部分拥蒋势力所发起的“党政革新运动”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美籍学者易劳逸（Eastman, Lloyd E.）首先发表了有关“党政革新运动”研究论述。易劳逸在其所著的《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一书中，以“国民党的政治内幕”（*Politics Within the Regime*）为题，对于革新运动有专章的介绍，并将革新运动与国民党内的派系现象结合，视之为国民党的政治内幕，探讨党政革新运动与国民党内派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易劳逸认为，革新运动的主要背景来自于国民党在中日战争后期所面临的困境，然而，主张党政革新运动的国民党人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借此进行党内派系的斗争。而随着战后各项政治议题的发展，革新运动中派系斗争的成分亦逐渐升高，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革新分子借着党政革新运动的推展，不断地对主张实务政策的政学系分子展开攻击。因此，易劳逸指出，虽然革新分子对于党内派系林立的现象大加抨击，然而革新集团只不过是国民党内众多派系的又一派系^①。

除了易劳逸的论述之外，目前有关此一党政革新运动的研究，仅散见于各相关著作中，诸如：1996年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王良卿所发表的硕士论文——《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以及林能士的《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与国共商谈——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探讨》。王良卿在论述党、团关系

^① 中译本：〔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王知贤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英文本：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时，以单一章节的篇幅介绍党、团在革新运动中的合作与对立^①，而林能士教授则是在探讨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对战后国共关系的影响时指出，CC派为了牵制政学系，在六届二中全会发起了革新运动^②。

此外，大陆方面的著作则有完颜绍元的《大接收》与黄嘉树的《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不过以上两书似未能窥得党政革新运动的全貌，以致书中叙述与事实有所出入^③。

至于其他有关党政革新运动的论述，大多是相关人士的回忆，如毕业于黄埔军校，与黄埔系和党务系统皆有密切关系的黄宇人的自传式回忆录《我的小故事》^④，萧铮的《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⑤，近代中国出版社编印的《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以及萧赞育著《梅园文存》等^⑥，其中萧铮和黄宇人对于革新运动的叙述，更是笔者赖以建构党政革新运动来龙去脉的主要史料。而黄宇人的回忆录更是研究国民党内部派系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政治内幕的宝贵资料^⑦。

此外，具有桂系背景的程思远在其所著《政海秘辛》一书中，亦对党政革新运动一事，着墨甚多^⑧。不过当笔者将程书与黄宇人的回忆录互较后，发觉两书所述雷同之处甚多，由于黄宇人之书出版

①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第三章第三节，《革新运动中的派系运作》，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6月，页174-191。

② 林能士，《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与国共商谈——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探讨》，《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关系文化基金会，1996年，页936。

③ 完颜绍元认为革新运动由复兴社、三青团分子所发起，CC不过承其口号、主张，而黄嘉树则认为CC在1944年即组织“革新俱乐部”，皆与事实有所出入。参见：完颜绍元，《大接收》，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8月，页238；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4月，页143。

④ 黄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册，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82年2月。

⑤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年12月。

⑥ 蒋京访问、纪录，《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萧赞育，《梅园文存》，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8月。

⑦ CC派的萧铮与具有黄埔背景的黄宇人，皆是主张党政革新运动的健将，因此两人皆在其回忆录中对于革新运动有不少介绍。

⑧ 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

较早，故本书在引用时，大多以黄宇人的书为主，不足之处再辅以程氏所著。

本书除了引用上述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之外，还运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所藏第五届、第六届中全会会议资料，其中各项会议的速记资料尤为珍贵。

现藏于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之会议速记，系当时会议会场的工作人员以速记方式记录与会人士的现场发言，而且并未经过事后润饰。因此，经由会议速记的引用，研究者更能从中观察出各发言人的态度与立场，可以说是研究当时国民党内各个派系，对于战后各项政治议题所持立场的关键性史料。据笔者所知，此一会议速记资料从未对外公开，而如今虽已开放给研究者使用，但使用情形仍未普遍，且本书系首度引用。本书所引用的速记资料是以1944年国民党第五届十二中全会、1946年第六届二中全会以及1947年的六届三中全会等会议的速记为主。

三、研究方向概述

本书以国民党内的派系政治为中心，以党政革新运动为题，透过国民党内的革新分子对于战后东北问题与国共协商等议题的态度与立场，观察战后国民党内拥蒋派系——主要是政学系、CC派以及以黄埔系、复兴社、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主的“黄、复、青系统”，三大派系彼此之间的互动情形。因此，对于革新分子在党政革新运动期间所提出的各项政经主张的细节，将不是本书的关注对象。

此外，由于派系内幕通常隐晦不明，因此必须依靠许多忆述资料加以重新建构。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加上个人所持政治立场与角度的偏颇，以致当事人之回忆，经常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与史实或事件真相有所出入。故笔者在行文之际，必须多方比较多位当事人之说法，以求得事件之真相。因是之故，笔者乃于注脚中行文罗列、说明。

除绪论和结论外，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首先介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崛起与拥蒋派系势力的壮大，及拥蒋派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 国民党内拥蒋派系的 崛起与对立

“派系”（Faction）活动乃是人类政治社会中，权力运作过程的普遍现象^①，而且政治社会的决策模式愈不制度化的国家，派系活动空间也就愈大^②。此外，学者张玉法也指出，“凡一党专政的国家，党外无党，党内分派；分派的原因，有的是对政策的意见不一，有的则是树立势力，图控制政权”^③。故虽然国民党人一向讳言派系，但从国民党党史上党内政治势力纷争不断的历史观之，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乃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24年孙中山着手国民党改组之际，国民党人即对改组一事存有不同意见，党内因改组而起的左、右派之争若隐若现^④。

① “派系”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活动的范畴，亦存在于人类其他的社群关系中，诸如：商业团体、教堂（宗教活动）、劳工团体、各种集会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本书所指的派系现象系指政治活动而言。参见：Bellioni, Frank P. and Beller, Dennis C.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lio Press, 1978.

② 研究派系政治的学者陈明通认为，中国在两千年的帝制传统崩溃后，引自西方的共和体制与代议政治并未能发挥功效，后继者又无力建立新秩序，因此造成了民国以来中国政局派系林立的现象。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页10-11。

③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9月，页277。

④ 不论早期国民党内的左、右两派之分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分化策略，或是国民党人基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手段所产生的不同看法，至少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人即对国共合作一事持有不同的意见。参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0月，页297。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左、右两派公开对立，其中西山会议派首先发难，于上海另立党中央。不久之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现象又加入了国民党人因竞逐党权所引发的派系斗争，陆续出现了以胡汉民、汪精卫（包括日后的改组派）、蒋介石等人为中心的派系势力，以及大小林立的地方实力派等，以致党内派系之争，纷扰不断，国民党党权也因而历经多次的分裂与重整。

虽然国民党内的派系现象复杂多变，但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并先后取得党、政、军三方面的重大权力，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与各派系间的关系，乃是国民党派系政治的主要现象^①。与此同时，伴随着蒋介石政治实力的提升，一批以巩固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为中心的国民党派系势力亦逐渐壮大，这些拥蒋派系至少包括政学系、CC派以及以黄埔系、复兴社为主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系统^②。这些来自于拥蒋阵营内部的派系势力，彼此之间有合作，也有对立。本章重点即在于叙述蒋介石革命地位的提升与拥蒋派系势力壮大的因果关系，以及拥蒋阵营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对立关系。

第一节 拥蒋派系的形成

来自浙江奉化的蒋介石，为了在粤籍人士所主导的国民党内占有一席之地，其所引用之人基本上以浙江籍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为主，前者如CC派，后者有黄埔军校毕业生以及由黄埔精英所组成的复兴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③。1930年代以后，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

^①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页1。

^② 曾经参与复兴社活动的黄埔学生萧作霖指出：“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CC团认作是蒋介石的‘螟蛉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此语亦透露了拥蒋派系彼此间的矛盾与对立。参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页55。

^③ 王学庆，《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3月，页280。

以杨永泰、张群等人为中心的政学系分子，在蒋介石的重用下，亦渐在党政各界占有一席之地。至此，蒋介石逐渐掌握了中国政坛党政军各方面势力的绝对优势，并跃升为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一、黄埔系、复兴社与三青团

有谓蒋介石用人向来依赖“三缘”——血缘、学缘、地缘，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恃以崛起的依据——黄埔军校学生，则与“三缘”中的地缘与学缘有密切的关联^①。

1924年国民党在苏联的协助下，联合中共，进行改组，并于广州黄埔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以为革命武力之后盾。黄埔军校的成立对于国民党的革命事业深具意义，对于蒋介石个人政治地位发展，亦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成为蒋介石拓展其在国民党内政治实力的主要凭借之一。

蒋介石自1924年开始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后不久，即指示陈果夫在上海设立募兵机构。此时军校所募得之新兵大多来自于蒋介石的故乡，或其邻近地区——江浙一带，及长江中下游等地的良家子弟，与蒋介石有着相当密切的地缘关系。入伍新生在语言与地理环境的双重阻隔下，逃亡不易，加上此时蒋介石对于军校的大小诸事，必定亲身参与，经常与学生保持密切接触，因而与黄埔学生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师生关系^②。

经由此层关系，蒋介石与早期黄埔学生之间的往来，实已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与中国传统师徒的忠诚关系，“他们与蒋维持着一种深远又难以取代，甚至超过一般上下层级制式的从属关系”^③。而

^① 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页75-76。

^② 1924年7月黄埔军校开始招生，招生机构初设于上海，由陈果夫主持，此时所募之新兵大都来自浙江，尤其是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一带，以及绍兴、金华、台州和处州等地，其次为江苏和安徽两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月，页31。

^③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6月，页24。

且，早期黄埔学生向以无畏的战士闻名，不少人把蒋介石视为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践者，因而将本身对革命的热情与军旅生涯的发展，化成对蒋介石个人的紧密追随。

由于国民党改组初期，孙中山特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参加革命工作，因而造成了日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争执。而此一情况，在国民党赖以培养革命武力的黄埔军校亦难免除。

军校成立之初，共产党人即在校内从事政治工作，并由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暗中宣传共产思想，吸收党员，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反共学生亦筹组“孙文主义学会”以资对抗。1926年“中山舰事件”过后，蒋介石以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的存在，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破坏学生团结，乃下令撤销^①。然而，为了防范左倾学生重新组织，再生事端，蒋介石乃于1926年6月，指示蒋先云、冷欣以及曾扩情等人，组织“黄埔同学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会的简称），强调效忠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及绝对服从校长（蒋介石）的领导等信条，尤其禁止从事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相关活动，逐步建立起蒋介石与黄埔学生之间的特殊联系^②。此后，无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或是其他非蒋嫡系的杂牌军队，只要有黄埔学生的渗入，都普遍存在着与黄埔学生关系密切的组织与活动^③。

1927年蒋介石下野，桂系军人所主导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结束“宁、汉分裂”，并达成“宁、汉合作”。为保存政治实力，凝聚黄埔学生的向心力，蒋介石乃将“黄埔同学会”交由在上海的朱绍良指挥，并由曾扩情重新担任秘书一职，以“团结在职的

① 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页172。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页602；黄宇人，《我的小故事》，上册，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82年2月，页130；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页173-174。

③ 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页174。另据康泽所述，蒋介石曾派遣十余名黄埔学生到云南龙云的部队中去“做工作”，而他本人亦曾被蒋派为专管所有分派到各部队的黄埔学生的报告和信件。参见：潘嘉钊、钟敏、侯俊华、李慕真编，《康泽与蒋介石父子》，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年12月，页22。